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阐释

周建新 谢金苗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战略目标、改革内容以及未来趋势，是文化政策驱动下的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政策导向方面，文化产业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时代语境中，凝聚改革共识；战略目标方面，文化产业要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文化创新、坚持人才培养，明确发展方向；改革内容方面，文化产业要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构建综合体系；未来趋势方面，文化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握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动向。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使命的高度自觉，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实保障。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5)01-0012-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改革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意义，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的高度融合，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研究缘起：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文化产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文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所取得的成效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历史演变，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展现良好态势，各项成就与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和战略导向紧密关联，

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暨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24&WZD04）；深圳大学2035卓越研究计划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2YZD2310）。

构筑了一个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凝聚改革共识、积蓄改革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政策维度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事业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纪元。彼时尚未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但我国文艺创作环境显著改善，文化产业属性已然萌芽，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随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概念的明确提出，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推动文化市场向规范化、法治化方向发展。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涵盖广告、娱乐、传媒、旅游、体育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针对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从多维度、多层次突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地位。《决定》关于改革的举措覆盖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民生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多个领域，体现了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被提升至分论部分，体现了文化领域改革重点的拓展与深化。“体制”一词聚焦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化框架，形成各层级的运作体系，构成了系统运行的基础；而“机制”则强调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与运作方式，确保各系统有序高效运转。文化体制改革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的某一具体环节，而是深入到文化体制的各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创新，更加注重改革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回顾发展历程，我国文化建设经历了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再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演变，以更高层次的要求、更高层次的成效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文化放在改革议程的重要位置，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转

折点，擘画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从研究维度看，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我国文化建设发展历程、文化体制改革演变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等。一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百年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逻辑等主题，梳理了文化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如岳奎将我国文化建设时期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并对应文化斗争、文化发展、文化改革、文化复兴四个历程^[2]。范周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化建设进行回顾与展望，将我国文化建设历程分为奠基期、停滞期、恢复期和繁荣期四个阶段^[3]。二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化，学者们关注政策背景、理论依据、改革要点以及未来趋势，揭示其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如陈庚回溯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进展以及当下的研究向度^[4]。傅才武指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从外层制度改革向核心制度改革、从微观机制创新向宏观体制改革次第深入，进而分析了其直接动因与底层逻辑^[5]。三是学界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力求把握改革的总体导向、基本原则及核心任务。如李书磊解读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要求以及具体举措^[6]。田嵩燕从改革规律和改革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既往文化改革的经验，探索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7]。四是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的关系论述与路径探索，但较少关涉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解学芳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8]。高书生总结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结合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点任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9]。王金会结合文化政策演变，指出文化产业历经规划引导期、战略纵深发展期和高质量发展期，呈现阶段性特征^[10]。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与产业趋势，揭示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关

系，对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探讨尚显薄弱。

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仍存在值得深耕的空间。其一，学者们已深入剖析中国文化建设历程的演进轨迹，但其关注点往往汇聚于国家重大历史节点与核心政策层面，较少涉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最新内容。其二，关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缺乏对文化层面的深入解读，尤其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文化产业这一关键议题，亟待更为系统全面的探讨。本文阐释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引领作用，为文化政策驱动下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二、政策导向：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共识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三大时代语境下提出的，这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目标，提出了战略支撑，提供了强大引擎。

（一）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宏伟目标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以来，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1]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改革可以有效打破束缚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各种文化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及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整体构成战略协同关系^[12]。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应明确发展目标和定位、

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建设骨干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构建现代文化市场治理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动力。

（二）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战略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映射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13]，即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意识形态的坚守。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中国改革事业提供了科学方案，真正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在文化领域展现了强大的软实力。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其目的正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局。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彰显了中国文化产业特色，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提质增效，扶持新型文化企业持续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5]。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产业应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明确自身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定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国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民族气派、时代特征的文化产品。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引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系统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16]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变，意味着改革工作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标准与期望。在这一过程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关键一环被明确纳入，改革力度和广度不断加强。习近平

总书记还指出“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7]，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应注重制度革新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这要求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要对既有制度进行全面审视、科学评估与适时优化，巩固发展文化事业的根基。同时，还要注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健全治理机制并提高治理效率，全面提升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完善治理机制、健全法律制度、创新治理模式^[18]。在文化产业领域，既要高度重视构建文化市场治理体系，又要着力提升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战略目标：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四大方向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涉及文化产业层面，可归纳出四大核心导向，即意识形态的引领、人民至上的导向、文化创新的驱动以及人才队伍的建设，并分别作用于文化产业的指导原则、发展动力、内容创新以及人才培育，共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

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正确方向，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其本质是深刻塑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选择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深刻阐释了“为什么建设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等重大问题，实现了“宏观上的思想引领、中观上的战略引领以及微观上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引领”^[19]，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意味着在改革过程中，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沿着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稳步前行，并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

（二）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角度发展文化产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2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筹划期间，文件起草组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收集了1911条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了221处精心修改，使每一项决策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人民。这是因为人民不仅是推动改革实践的关键力量，也是改革成果的主要享有者，更在评价改革成效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文化产业领域，人民是文化产品的服务对象、共享群体、责任归属以及评价主体，从根本上决定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领下，文化产业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自觉担负起传承文化精髓、弘扬正向价值观及满足人民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的重任，朝着更加稳健的方向迈进。

（三）坚持文化创新

在新的起点上坚持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明确写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中，使之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对于文化产品而言，其原创能力和创意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对增强文化产品的原创价值、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文化产业还应注重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创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新型文化业态与跨界融合的模式创新、形象塑造与价值提升的品牌创新。新时代新征程，文化产业应以更高的站位推动文化创新，认真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不断开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四）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育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教育、科技、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支撑，并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全会指出要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着力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以及高技能人才，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文化产业是高度人才密集型领

域,既需要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艺术家、设计师等创意与艺术人才,也需要精通数字技术和媒体运营的软件开发师、数据分析师等技术人才,还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品牌管理、项目运营等能力的管理与营销人才,以及擅长跨文化交流、语言翻译、海外传播的国际型人才,多元化、高层次的人才需求缺口较大。我国文化产业应积极响应号召,完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文化产业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四、改革内容:构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综合体系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内容广泛,其维度与跨度均跃升至崭新境界,有助于建立健全覆盖文化产业各领域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该体系不仅触及文化企业内部机制的革新与管理模式的创新,还涵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优化与多元化策略的推进,同时着眼于新型文化业态的孵化与茁壮成长。

(一) 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注重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安全战略支撑作用。2023年,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566亿元;年末,文化企业资产总计19620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7.6%^[21],资产规模扩大,整体效益提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22]。在文化产业领域,改革要从两个关键维度引领国资国企迈向更高水平。一方面,国资国企需着眼意识形态属性,发挥带头导向作用,以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回馈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另一方面,坚持人才强企战略,通过强化人才培养与管理机制,打造高素质国有文化企业人才队伍,以人才为核心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人才总量偏少,文化企业体制机制不顺畅、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高端人才匮乏、员工队伍活力不足以及考核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突出。文化产业应聚焦人才培养,加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激发人才队

伍活力,完善绩效和考核机制,提升国资国企的人才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 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重视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和质量提升。我国文化产品正面临以下发展困境:供需矛盾突出,高质量产品难以获得应有的市场回报,低俗产品广泛流通并获取高额利润;原创产品稀缺,缺乏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元素且具有独特性的原创作品;技术融合缓慢,未能及时跟上数字转型步伐和数字消费趋势,难以充分释放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巨大潜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对于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具有三重引领作用:其一,塑造社会风尚,实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通过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品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使更多具有正能量、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涌现。其二,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出台相应扶持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文化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推动文化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打破地域、行业壁垒,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三,鼓励多方协作,有效提升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用效率。通过政府、企业、创作者等多方面的共同协作,落实政策引导、人才培育、技术创新、资金支持和市场监管等措施,推动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持续优化。

(三) 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我国相关政策的表述先后经历了从“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到“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再到“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转变,表明我国新型文化业态从早期培育阶段转向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革新传统文化产业的必然趋势,而新型文化业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推手。就2024年前三季度而言,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9668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41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23],文化产业规模向更高层次迈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宏观层面的政府调控、中观层面的

产业结构以及微观层面的协同效应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实现政府调控与战略引领。我国各大政策明确了新型文化业态的战略定位，坚定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强调了新型文化业态的战略地位。在中观层面上，推动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鼓励运用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催生如数字影像、数字娱乐、数字设计等新型文化业态，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微观层面上，重视发挥多维度协同效应。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跨界融合、加强人才培养引进、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等多维度措施，形成文化产业与其他领域的紧密联动与协同效应。

五、未来趋势：明确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动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创新浪潮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区块链、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速崛起，文化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政策导向明确，力度持续加大，政策逐步显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发展方向，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出台，2024年国务院将“深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预示文化产业数字化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多次提到“科技”一词，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文化产业增添强劲动力。随着政策的持续演变与深化发展，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动向。

（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让文化科技融合释放文化生产力

从理论层面看，相较于科技发展的迅猛势头，我国政策指引和理论指导存在相对的滞后性，过往的理论框架在深度和广度上尚不足以充分支撑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2024年1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4]，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作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本年度政府工作的十大重点任务之首，为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其中，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手段^[25]。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理论需求和研究领域，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和高效。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并深入研究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构建一套能够解释和指导文化科技融合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引导和支持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二）实现机制、平台与人才创新，加速文化与科技融合进程

从实践层面看，以政策引导、市场牵引和人才驱动为导向，推动创新发展机制、加强服务平台建设以及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第一，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创新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入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具体的教育、科技以及人才的一体化改革举措，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通过促进高校、研究机构与文化产业界的合作，鼓励跨学科教育，培养具有跨界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第二，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科创平台建设。通过搭建科创平台，整合文化元素和科技资源，将文化和科技融合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满足市场对文化和科技融合产品的需求。创建新型科技项目孵化平台，倾力开发培育文化产品IP，开展跨界的科技项目合作，有效开拓文化市场。第三，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人才培育机制。通过制定和实施人才规划、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和有序流动机制、强化人才激励机制等途径，建立健全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

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科技人才发展环境,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2] 岳奎, 张鹏启, 李敏.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特征及经验启示 [J]. 理论探讨, 2023, (2).

[3] 范周, 侯雪彤, 宋立夫.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6).

[4] 陈庚. 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一个理论述评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

[5] 傅才武, 秦然然, 饶伟达.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向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9).

[6] 李书磊.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N]. 人民日报, 2024-08-07.

[7] 田嵩燕.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与展望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 (10).

[8] 解学芳. 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 [J]. 学术论坛, 2007, (8).

[9] 高书生. 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9, 9(3).

[10] 王金会. 文化政策驱动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关键性问题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1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0-11-04.

[12] 王波, 李晴晴. 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三重建设机制 [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2(1).

[13] 宋才发.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J]. 党政研究, 2024, (5).

[14]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J]. 哲学研究, 2019, (7).

[15] 张振鹏.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向度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0(5).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78.

[17]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J]. 党建, 2024, (8).

[18] 徐稳.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路径探赜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8(4).

[19] 周建新, 吴美英. 习近平文化思想: 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 [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23, (6).

[20]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8.

[21] 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8.2% [EB/OL]. [2024-01-30]. 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29_1946971.html.

[22] 陈立旭. 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与两个效益相统一 [J]. 治理研究, 2024, 40(5).

[23]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9% [EB/OL]. [2024-10-30]. 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0/t20241030_1957206.html.

[24]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EB/OL]. [2024-05-31].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761.htm.

[25] 向勇.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价值旨归和逻辑进路 [J]. 艺术百家, 2024, 40(3).

作者: 周建新,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创新发展)执行主任、二级教授、博导
谢金苗,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周修琦